

「冷戰史與臺灣」國際工作坊紀實

陳芷盈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2012 年 12 月 15 日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與日本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合辦了「冷戰史與臺灣」國際工作坊。這場集結了五國學者、領域涵蓋政治、外交諸面向的學術盛宴，除日本、臺灣學者外，還有美國、英國與俄國知名學者參與，充分展現冷戰史研究之國際性。而特別選擇在臺灣舉行這樣的國際工作坊，一方面有鑒於近年臺灣官方檔案開放對相關研究之助益外，也有意與一向致力於發展臺灣近現代研究的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進行合作交流。此次工作坊提出 9 篇研究論文，共計 17 名學者擔任評論與發表角色。全體參與者近百名，並與許多國內學者共襄盛舉，而透過本工作坊，不僅在學術上交換分享雙方研究成果、提升學術能量，對於臺灣與國際之接軌與交流更有豐碩成果。

工作坊首先由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 David Wolff 教授與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所長共同主持開幕式，假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舉行。開幕式中對於臺灣冷戰史料公開現狀進行專題討



全體人與評論人合照（照片提供／主辦單位）



論文發表（照片提供／主辦單位）

論後，隨即展開每場 3 篇共三場之討論與交流。

首先登場的第一主題為「冷戰史與臺灣：內政」，主持人為薛化元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劉維開教授所發表的〈「救總」的成立與初期發展〉一文，史料上使用救總所編印業務書籍，以及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之《救總檔案》。這是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自 2011 年起，在救總的同意下，對於其所保存之歷年檔案進行數位化之檔案，現已完成兩批，內容以救總在港澳地區相關救助活動以及救總參與國際援救中國難民為主。本文透過上述史料，對於救總成立經過及其成立前十年相關工作與發展，作一概略性陳述，藉以了解救總在兩岸對峙時期的功能及其發揮的作用。

「救總」為中華救助總會的簡稱，前身為 1950 年 4 月 4 日成立於臺北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87 年解除戒嚴後，因開放大陸探親、探病、奔喪及旅遊，兩岸

關係產生變化，該會於 1991 年 7 月 20 日改為「中國災胞救助總會」，2000 年 5 月 5 日再更名為「中華救助總會」迄今。救總係政府遷臺後所成立的第一個重要人民團體，已有六十二年歷史。其工作早期以救濟大陸災胞為主，後來逐漸擴大轉型為以「關懷、救助、服務」為信念，辦理國內外急難救助、社會福利服務與國際人道救援之社會福利團體。然而，早期救總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以救濟大陸災胞為主要工作，可以說是「自由中國」對逃離大陸「難胞」的主要支柱，其重要性不容小覷。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 Julia C. Strauss 教授的“Reflect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Comparing Archives from Early Cold War Period China and Taiwan”一文中，除了比較中國與臺灣的政府檔案兩者的特色與差異外，更透過親身考察臺灣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資料，使得她對於諸如土地改革等議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林果顯助理教授〈1950 年代國民黨政府宣傳體系塑造的國際觀——以《宣傳週報》為中心〉則試圖回答「當處於無法自由出入境、外文資訊受到管制、政府對於異議言論取締日趨嚴格的情況下，1950 年代的臺灣人民是如何認識世界？」或者說，黨政宣傳體系如何形塑當時臺灣人的國際觀？當多數的臺灣住民都無法擁有多元方便的管道來直接認識世界時，他們除了透過體制內的教育外，像

是報紙、雜誌與廣播等大眾傳媒便成為一般人國際觀的來源，然而這些媒體的宣傳主軸、時機與步驟皆受到宣傳命令的指揮與影響。本文以收錄這些宣傳命令最為完備的國民黨中央第四組機關刊物《宣傳週報》為主要史料，統整出在當時冷戰情勢與自身國家利益的影響下，其所呈現之國際觀有三項特點。第一、敵我關係分明，以「反共」或是「是否支持中華民國」作為媒體批露以及評價之準則。第二、強烈主張戰爭，認為只有戰爭才能徹底解決共產主義，並對冷戰狀態的長久化表達強烈的憂懼。第三、以姑息政策和中立主義等濃厚道德性的名詞批判各國外交政策，一則傳達了大國的想像，二則強化政府堅持正確政策的勇氣形象。顯示出當時的國際觀，外國或許不是關懷的核心，如何從國際情勢中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才是重點！其所映照的是自身國家利益，所表達的自我形象則具有國民黨政府特色。

經過中午簡單的餐敘與討論後，隨即展開了下午的場次。

下午第一場為「冷戰史與臺灣：外交（一）」，由日本中央大學總合政策學部副教授泉川泰博擔任主持人，而開場的日本京都產業大學外國語學部國際關係學科副教授吉田豐子在〈民族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權衡與抉擇：1945年中蘇條約談判中國國民政府對蒙古問題之因應〉一文中，主要以中國方面談判紀錄、莫斯科的國民政府代表與國民政府之間的往來電報、美國文件等為主

要史料，以國民政府的策略性妥協與努力為切入觀點，來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的蒙古問題。而新史料的應用，使其研究與以往相較更帶新意。

緊接著 David Wolff 教授發表“Stalin vs. T.V. Soong, June-August 1945: Comparing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cords”，從史達林與宋子文會談為開端，比較了中國方面的副本與 2000 年公布的俄羅斯外交部速紀錄後，他發現雖然對話內容大致契合，不過在俄羅斯方面則刪減了部分詞句，以讓史達林看起來更聰明一些，反觀中國方面，則連史達林是不是笑著說話都詳細地記載下來。以這個問題為發想，David Wolff 透過比較英文、俄文與中文對相關事件的記述，剖析其間的差異和造成差異的理由，試圖對既存之的歷史認識另闢新觀點。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李福鐘〈1960 年代臺美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兩次爭議〉一文，探討 1961 年美國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任內，以及 1966 年詹森（Lyndon B. Johnson）總統任內，皆曾為了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與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發生嚴重爭執。這兩起事件，一方面呈現出蔣介石政府極度僵硬且不切實際的外交路線，企圖在聯合國大會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你死我活的「零和競賽」（zero-sum game）外；另一方面，亦顯示出在全球冷戰的框架之下，臺灣雖是美國對中國共產黨執行圍堵

(containment) 策略的一環，不過實際上，臺灣或基於自身政策目標、或出於特有意識形態及利益考量，仍不時與美方有相互猜忌和齟齬爭執產生。而兩造在檯面上和檯面下的協商過程，以及最終解決的途徑，皆可作為冷戰期間美國與盟國互動模式的特殊參考案例。

下午經過簡單茶敘後，David Wolff 主持最終場：外交的第二部分。

首由國史館協修周琇環〈中華民國政府對韓戰反共義士的安置〉一文討論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中華民國重新成為美國的盟友，蔣介石雖曾主動提出派兵參加韓戰而未能實現，但藉由蔣派員在聯軍戰俘營中進行心戰策反工作，依然配合上美國的韓戰心戰布局。爾後反共義士取得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諾，接受其來臺，再經美國杜魯門政府決定以志願遣俘作為最終政策，使其遣返臺灣得到定論。而中華民國支援聯軍心戰工作，最早可溯及 1950 年底駐韓大使館介紹的通華、美語人員。次年停戰談判開始時，美國 CIE 又僱用來自臺灣的教師與戰俘接觸。1953 年 2 月艾森豪總統宣布終止「臺灣海峽中立化政策」後，鼓勵了中華民國的反攻大陸行動，藉以迫使中共同意韓戰停戰。3 月史達林去世，國際共黨陷入群龍無首之態，停戰呼聲遂甚囂塵上。於是時蔣在主持「外交宣傳會報」席上，討論韓戰停戰的利弊，邵毓麟提議妥為運用戰俘。結果由陳建中前往釜山的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成立

「指導小組」，就近策動巨濟、濟州島戰俘營中傾向我方戰俘，並不斷透過華籍譯員，指導反共戰俘，形成組織，進行策反。根據韓境停戰協定，韓戰交戰雙方同意將不願直接遣返回國的戰俘，交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處理。至 1953 年 12 月，終止解釋工作的同時，聯軍統帥赫爾上將宣布，運用一切方式，於 1954 年 1 月間使 1 萬 4 千名華籍反共義士送往臺灣。反共義士的來臺，係由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負責反共義士的安置，而使反共義士成為國軍的一支生力軍。該文以韓戰反共義士來臺為例，由決策訂定、心戰策反、安置與宣傳等方面，論述蔣中正對反共義士出路的安排及其反攻國策下的初步宣傳行動。

之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員松本はる香所發表的“Chiang Kai-shek's Vision for Returning to China in the 1950s: A Perspective from Taiwan's Archives”一文中，松本教授發表了目前研究之目標與方向。其試圖利用臺灣所藏之檔案，研究 1950 年代蔣介石反攻中國大陸的願景與藍圖。尤其是 1950 年代的兩次臺海危機中，美方高層與蔣介石之談話內容，更是目前調查之重點部分。

諾丁漢大學寧波分校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at Ningbo) 的 Sergey Radchenko 的“Taiwan's 'Silver Bullet Diplomacy'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1988-1992”一文，在討論臺灣與蘇聯關係時，採用國內相關研究上較為罕

見的俄文史料。這些資料存放於莫斯科，包括外交部檔案和蘇聯國家檔案。雖然這些史料並不完整，但是內容從趣味圖片到如何就臺灣問題與中國磋商、甚至是蘇聯內部討論如何討好中國之決策等等都有，可說非常豐富且多元。而透過 Sergey Radchenko 教授之介紹，對於臺灣學者在史料應用上絕對有很大幫助。

最後，在薛化元教授與 David Wolff 教授聯合主持下，閉幕式圓滿結束。

首次在臺灣舉辦冷戰史國際工作坊，目的即在於透過多國籍、多語言及多檔案（multi-nation, multi-language, and multi-archive）的方式，進行深度的學術對話。即使在科技的輔助下，學術訊息的流通已日趨迅速與便捷，但囿於學術養成的在地性與語言工具的使用，各國學術社群仍舊各有擅場。本次工作坊邀集臺、美、俄、英、日等地學者參與，從不同方面進行交流，由於不同國家學風相異，學術上的專攻部分各異其趣，對於同一資料或事件的看法也紛然並立，透過此一工作坊，能在充分的時間中交互辯難與互相學習，對於吸收各國學術成果與介紹臺灣研究成效，有相當助益。此外本次工作坊發表的文章，利用各種不同語言的一手資料與二手研究，使得過去難解或習以為常的認識有了重新解釋的可能，例如本次工作坊 David Wolff 教授所發表的論文，即是透過英文、俄文與中文對同一事件的記述，比較其間的差異和造成差異的理由，對

於既有的歷史認識另闢新觀點的嘗試。

由於利用多元材料就是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本次工作坊利用的檔案資料涵攝不同層級，呈現出多元風貌。像是 Julia C. Strauss 教授利用中國與臺灣的政府檔案，比較兩者的特色與差異。Sergey Radchenko 與 David Wolff 教授使用了俄國官方檔案與回憶錄，吉田豐子與松本教授利用中國與臺灣的政黨史料，皆使研究更帶新意。臺灣方面的發表者更是利用近期開放的政府檔案，發表新開拓的成果，引起與會成員熱烈的討論。

由於一直以來國際對於冷戰時期的研究多著重在美蘇關係與歐洲各國上，對於同時期亞洲各國相對缺少關注。有鑑於此，近年來日本學界益發專注於冷戰時期之研究上，並在累積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上，展開了與亞洲諸國學者交流分享之計劃。而考量臺灣在冷戰防堵的戰略位置以及與日本就歷史上的諸多關聯性下，日本北海道大學提出了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交流的期待，而有了這次深具意義的國際性工作坊之誕生。而本次的工作坊首創標舉「臺灣」與「冷戰」，與會學者更囊括日本、美國、英國、俄國與臺灣等地學者，考量冷戰研究的持續性與發展性，這樣的國際性交流活動不僅在學術上有助於臺灣自身研究視野的提升，對於臺灣參與國際事務、提升國際地位亦有莫大幫助。